

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動

馮爾康

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堂和信眾俱多，本文藉《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修靈筆記研究》、《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及《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三書文獻，略述當時中國天主教徒在江南的宗教生活、文士與傳教士的交遊和影響。

清代前期江南是天主教繁盛教區，當代比利時漢學家高華士在《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修靈筆記研究》中說順康之際：「上海傳教區，它是整個江南省也許是整個中國最爲繁華的教區之一。」（趙殿紅譯，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七；以下簡稱《魯日滿研究》）上海、江南是中國天主教繁盛之地，有鑑於此，筆者將對此種情形略爲敘述——介紹天主教徒活動實際情況，兼及其特點。本文所說的「江南」，不是指江南省，僅爲江蘇南部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五府和太倉州，傳教中心在上海、常

熟；常熟在雍正年間分爲常熟、昭文二縣，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昭文發生教案。本文所述時間，爲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前期，說是清代前期，是大體而言，並非嚴謹概念。本文所依據的史料和參考文獻，主要有三種，即前述高華士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二〇〇八；以下簡稱《檔案史料》）；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以下簡稱《文獻彙編》），而最主要的是第一部書。本文爲節省文字，據這三部

書所寫史實，一般不作注釋，僅在此表示謝意。由於筆者對江南天主教史僅是一知半解，不能作出全面論述，只好「點滴談」了。

西洋傳教士在江南的持續活動——教徒宗教生活背景

清代前期西洋傳教士的來華，其傳教事業受羅馬教廷傳教方針和清朝政府政策的影響，有發展有停頓，大體上是順康間頗有進展，曆法之爭時期有所曲折，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施行容教令，至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驅逐不領信票

傳教士的近三十年間，允許傳教和信教，是天主教在華大發展時期；及至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厲行禁教政策，乾隆朝繼續執行，傳教士遂轉入秘密活動狀態。江南潛匿、潛入的傳教士活動頻繁，遂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昭文教案的發生，其嚴重程度是署理江蘇巡撫安詳擬議將傳教士王安多尼、談方濟各處刑絞監候，會長唐德光、沈陶氏（沈寡婦）發邊外爲民。儘管如此，隨後仍有傳教士潛入。看來清代前期天主教的在華傳教可以說是經歷這樣的歷程：發展—停頓—大發展—潛伏存在。江南的情形也基本如此，但稍有不同的是，即使在曆法之爭的停頓時期，傳

教士被集中拘禁於廣州，由於他們事先布置中國人傳道員維持宗教活動，在常熟居然還吸收三百多名教徒，上海更爲上千人施洗。就此一事可知在江南的傳教士活動能量之大，傳教事業發展比較穩定。

在江南的西洋傳教士，清代前期有畢方濟、利類思、安文思、衛匡國、張方濟、賈宜睦、潘國光、魯日滿、柏應理、洪若翰、畢嘉、劉迪我、成際理、沈若望、安馬爾底玉、薄類思、楊若望、孟友藝、畢登榮、彭覺世、白維翰、穆瑪諾、何天章、王安多尼、龔安多尼、費地窩尼小、劉馬諾、談方濟各、張若瑟等等。嘉道以降也有，如梅若瑟、趙若望等。

傳教士們勤於布道，比如魯日滿（一六二四—一六七六）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的兩個月裏，在上海到了二十三座教堂，爲六百多人施洗。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在三天之內施洗一百一十九人，有一天晚上在崑山爲八十三人行洗禮。他因教務繁忙，積勞成疾，仍不停地探視病人，直至故世。談方濟各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到達昭文，基本上是居無定所，雇船各處行走，在蘇州、華亭、婁縣、上海、松江、寶山、嘉定等地吸收教徒。他們還使用華人爲傳道員、相公、會長、管堂，協助傳道和管理教堂內部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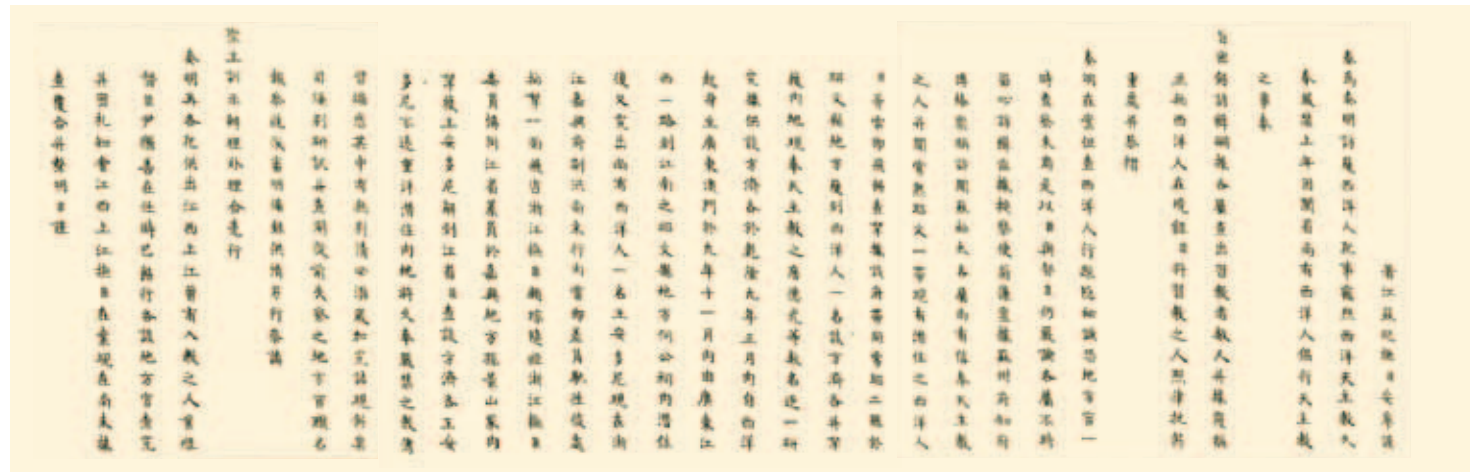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修靈筆記研究》封面書影 引自高華士《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修靈筆記研究》



鄧容安、莊有恭關於江南傳教士奏摺 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江南各地多有天主教徒活動中心及教會存在標誌的教堂，在不同時期數量不等，康熙前期上海由五十六座可以舉行正式感恩祭的教堂，增



安寧關於江南傳教士奏摺及乾隆帝硃批 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至九十四座。松江城內外有二十七座。常熟有耶穌會會院、城裏有兩所教堂，附近村莊有十四個教堂、二十一個傳教點。太倉、崇明、鎮江、無錫、南京等地均有教堂。上面提到的大小教堂有一百數十間。學者吳伯姬據有關資料統計，在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共有天主教堂二百五十九個（《康熙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二）；她統計的可能是大的或較大的教堂，而前述江南的百數十教堂中，儘管有很多小教堂，但是江南教堂之多，在全國屬於前列當是事實。

比較像樣的教堂，入口處安放盛放聖水的水池，室內有祭台，在它前面有帷幕，後面有安放聖人畫像的木架，祭臺上放置銅燭臺、焚香爐；講臺安放正廳兩邊，供傳道和主持使用。鄉村小教堂，門口上方有題字，有帷幕的祭台和聖像。教堂備有一些福音書，另備每年的中國教會禮儀年曆，即瞻禮單，作為傳教士組織活動和教徒宗教生活依據。

江南大量信眾接受了傳教士的布

在教會內部，傳教士組織各有

社會功能的多種類型的社團。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上海有一百四十個組織，常熟有十四個，有「十二使徒善會」，十二名成員從事鼓勵、敦促教區中懶於參加宗教活動的教友；「耶穌苦會」，即耶穌基督受難會，有一百五十名成員，星期五聚集教堂舉行鞭笞禮儀，唱禱文；「守護天神會」，對兒童進行信仰教育；「青年會」，培訓青年信徒成為講道員；「聖伊納爵會」，係文人會，參加的約有十數人，固定時間彌撒，討論抽籤選出的某一教義議題，交流所學心得，另外在教堂宣講教義，編輯宗教作品；「聖母會」，講述聖母歷史事蹟，目的是督促慈善事業的進行，在精神上、物質上對教友給予眷顧。另有輔祭童，平時在傳教士住處幫忙，男性青少年充當。各種善會皆備有器具，聚會時茶點招待會員；有的另有獎勵，給予宗教物品。青年、兒童、文人、婦女教友在這些社團裏活動，豐富了宗教生活。

信徒參加主日、節慶日活動，要

道。在上海，十七世紀四五十年代之際，有教徒二萬人，六七十年代增加到六萬人，八十年代達到七萬人。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常熟有教徒一萬人，在該縣總人口中大約四十人裏有一個教徒。雍正、乾隆禁教之後，在潛匿、潛藏傳教士活動下，仍有人受洗為新教徒。

看來清代前期天主教在江南的傳教基本上是持續的，順康間呈現興盛狀態，以致「曆案」中保持穩定狀況。江南天主教徒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宗教狀態下進行活動的。

教徒宗教生活一斑

江南天主教信徒的宗教生活的一般情形，從入教開始，依據教規從事禮拜與瞻禮活動，過社團生活，以及教會的特殊活動，擁有人生終點的宗教情懷與教會的關懷。

教徒奉教必有洗禮儀式，選取教名。洗禮的日子，多選擇在天主教聖人的紀念日，神父向成年人施洗，灑聖水，抹聖油，在女性洗禮時，神父為避免雙方之間的身體接觸，用金屬筆塗抹聖油。聖水、聖油意在使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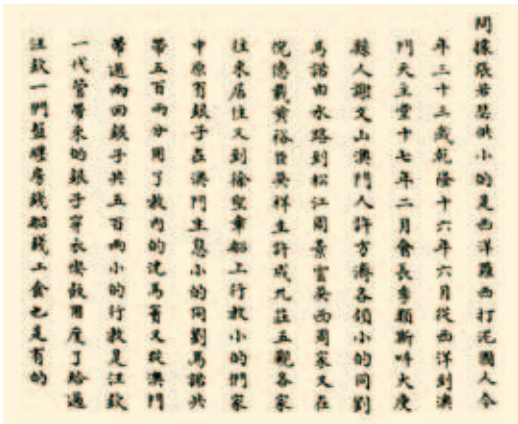
遵從教會的規範和要求，如希望在主要節日領聖體（發給聖餅），儀式前，必須做告解，甚至公開告解，剛抽過煙的人不得進行。慶典中信眾不僅是身到，還要心到，在彌撒結束前，共同詠誦「信、望、愛天主、痛悔和堅忍」，每詠誦一種德行鞠躬一次。聖母誕辰慶日，在教堂慶祝，常熟十二名兒童唱詩班在講臺上向信眾誦唱聖母德敘禱文。耶穌會中國傳教事業的開創者聖方濟各·沙勿略慶日，教徒在傳教士主持下集會，瞻拜沙勿略雕像。節慶日，傳教士有時將聖像送給虔誠教友，刻意加強聯絡，同時許多信徒訪問傳教士，雙方互動。

江南教徒的宗教生活，關涉到死亡和遺體安葬。有的信徒為自己製作十字架苦像，就是將耶穌受難像置於十字架之上，合為一體；還有把信仰誓詞刻在銀、銅製十字架苦像上，以期能夠「在聖教的腹中」死去。在他死後，傳教士就將十字架苦像安放在他的遺體上。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去世的松江人Siu Yun chan就有製作的十字架苦像。（《舊日



《吳歷傳》 引自光緒三十年《上海縣志·遊寓傳》

江南文人信徒，還在傳教士組織下寫作教義辯論性質的書籍，出名的是何世貞主撰的《崇正必辯》。何世貞，常熟人，諸生，教名伯多祿。康熙十一年（一七七二），針對反對天主教的代表人物楊光先的《不得已》論點，撰成《崇正必辯》一書，由利類思作序，說他是優秀學者，是多年來積極的教友。他是魯日滿的傳道員，當魯日滿因曆案離開江南的八年中，他和另一位傳道員謝西方維持教務，為新教徒施洗。常熟教徒Pauli寫作類似《崇正必辯》的書，為自己信教及教義辯護，對其他文人有影響，使得有些人入教。（《魯日滿研



傳教士張若瑟供詞 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初一、十五日念經」，念經也就是口念「耶穌」二字。（《文獻彙編》；《檔案史料》）教徒們的持齋守戒，是不吃牲畜的大葷，魚蝦之類仍可食用。總的來講，教徒家庭禮拜形式簡單，便於實行。

上述江南天主教徒的宗教活動，特別是有多種類型的團體，除了自身的行動，更參與全體信眾的宗教儀式，為它完滿地進行發揮作用，表明教徒和教堂是按照天主教教規從事宗教活動，是規範化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生活。

文士與傳教士交遊及信教

江南是人文薈萃之地，常熟所在地的蘇州，以出狀元而聞名於世，傳教士根據這種特點與文士交遊，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傳教目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文人追求新知識、新信仰，有的人就走進教堂，起著促進江南天主教事業的發展，為教徒的宗教生活添彩。

傳教士為傳教寫作、翻譯、印製福音書，信教及參加天主教某些活

究》，頁三六九）

像既有清朝初級功名的秀才又有天主教傳道員雙重身分的何世貞這類文人，在江南絕不是個別現象。傳道員Fan Yu van、唐天石、吳歷（一六三二—一七一八），以及Pauli，都是文化人，可能是「儒童」，但是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大多是傳道員，離開神職人員僅一步之遙，其中的吳歷後來成為神父——「中鐸」，這在十七世紀是不多見的。他是常熟人，字漁山，教名西滿·沙勿略，書畫家、詩人，著有《墨井詩抄》、《墨井題跋》，起先為魯日滿傳道員，後與隨同在松江傳教的柏應理去澳門天主教三巴堂修道，康熙二十七年（一六九〇）為神父，二年後到上海傳教，直至去世，葬陸家濱天主教墓地。比吳歷略早的是文士官員教徒許瓚曾和他的母親徐甘第大（一六〇七—一六八〇）。前面說到過的徐甘第大，無疑是知識女性，十六歲出嫁松江許遠度，勸導全家入教，用女紅所得捐建多處天主堂，以松江邱家灣教堂為著名，贊助在江南的傳教士，

動的文人參與翻譯和寫作。在江南的傳教士知道中國人看重書籍文化和江南的文化中心地位，適應此種情形，講求福音書的製作與傳播。利類思的《彌撒經典》、《聖母小日課》，安文思的《復活論》，潘國光的《聖教四規》，利瑪弟的《聖若瑟行實》，柏應理的《天主聖教百問答》，魯日滿的《聖教要理》、《教義問答》、《教要六端》、《領洗及領聖體對話》、《鄉間歌詞》，是教義入門、宗教儀禮、道德哲學的書籍，是進行基礎教義教育過程中的教材。這些著作，在松江、蘇州的傳教士不斷地加以重印，散發給信眾和對天主教有興趣的人。在付印之前，請當地文人進行文字修飾，使之適合中國人閱讀習慣，如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魯日滿說，「我又接待了審查新《日課》的文人們，請他們吃了早餐和豐盛的午宴」（《魯日滿研究》，頁一〇四），可知《日課》修訂版，就是由文人不止一次地聚會討論，從而協助完成的。儒會成員，很自然地會協助福音書印製事務。

甚至在金錢上援助曆案中被禁閉在廣州的神父們。長子許瓚曾，進士出身，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歸田，同乃母一起從事宗教活動，為潘國光的《十誠勸論聖跡》作序。教徒中有一批知名的和一般的文人，如許嘉祿，何世貞為他寫出《許嘉祿傳》；孟錫九，是浙江錢塘縣人，鰥夫，在蘇州教家館，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被談方濟各吸收入教。

關於江南信教之人，蘇州巡撫陳大受於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八月初六日奏摺中說，受天主教「邪說煽惑，凡好高騖遠索隱行怪者類多奉之，非僅愚夫愚婦而已」（《檔案史料》），「索隱行怪者」，指離群索居行為怪異之人，今日所謂的「另類」，他們又好高騖遠，顯然是怪異文人，即吳歷、何世貞一類的天主教徒。官員如此看待他們，是因為他們離經叛道，不可思議。文人信仰天主教，固然其中有科舉之路走不通的思想因素，不過他們邁出這一步，比一般民眾要艱難得多，他們在入教之前進行了天主教教義的探究，如閱讀教

盆中清翫

Pure Enjoyment in a Planter:
Paintings of Potted Scenery

展期 2013.4.1 - 6.25 陳列室 212

Dates 2013.4.1 - 6.25

Gallery 212



女信徒的虔誠

傳統社會要求女性三從四德，無所謂獨立人格，信教方面很難自主；由於男女有別，女教徒的活動常常有自己的場所——女教堂；女性一旦信教，就很虔誠，這大約是女教徒的特點。

像徐甘第大那樣的女性天主教徒能夠影響到丈夫子女全家信教，可能是個特例，因為她的祖父徐光啓是大學士，抱著外曾孫許瓚曾去受洗禮；其他的女性教徒的情形，基本上與此相反，受家長、丈夫的影響。要被官方發配的前述沈陶氏，丈夫沈玉書，隨同丈夫入教，教名亞加大，沈玉書在世時在家中建立密室，容留傳教士居住，沈玉書死後，沈寡婦仍以密室接待傳教士和女教徒。丹陽人王天佩

信教，讓三個女兒都入教，長女王大姑，因患重癆病，夫家不娶；次女王二姑，未過門夫死；三女王三姑，出嫁後丈夫出走。她們在娘家守貞，由於王安多尼說「一處禮拜念經容易升天」，乾隆八年（一七四三），王天佩送三女及許四姑、沈七姑五人到沈寡婦家密室修行。許四姑是教徒沈天如的未過門長媳，沈七姑是沈天如的侄女，未婚夫死，守貞。（《文獻叢編》）沈天如家族成員信教，表明女性是受男性家長影響而從教。

女教徒有專門的聚會場所和帶領活動的女傳道員。由於男女有別，教會和教徒捐獻者特別建立女教堂。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常熟、松江、上海都有聖母小聖堂，內設祭台，有多種聖母畫像，有的還有雕像。松江城外聖母堂，女信徒每年五次到此集會，進行宗教慶祝。傳教士為向女性傳教和女教徒活動方便，採取兩項措施，一是任用女傳道員，由她們帶領女教友在聖堂活動，並給予貧窮女傳道員資助。沈寡婦家中成為傳道地點，顯係女

教徒的負責人。另一是組織專供女教友活動的善會，即聖母會。

女教徒信仰虔誠，特別表現在捐獻方面。徐光啓的另一個孫女潘徐氏在上海陸家濱南岸捐贈大塊墓地，成為上海第一個外國人墓園，敬一堂主潘國光首先葬在這裏，前述吳歷也是安葬於此。徐甘第大在康熙十年至二十年的十年（一六七一一六八一）中每年給在上海的傳教士柏應理捐贈一千兩銀子。捐贈的大手筆，出現在徐甘第大姊妹身上，更多的是教徒少量的捐贈，魯日滿的眼本，記錄捐獻最多的是十兩銀子，其次是四兩，捐贈一兩、幾錢的人多。表明多數捐贈人不富裕，是普通百姓，而「女性捐贈者占絕大多數」。

（《魯日滿研究》）

總而言之，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堂和信眾俱多，教徒的宗教生活是較為規範的、豐富的，而文士的介入有以致知。三百年後來談說他們，對他們信仰追求的原因、內涵和社會意義，哪裡有多少了解？不無愧焉。■

作者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